

钱海岳《南明史·诸王传/表》补证续编

王浩淼，朱忠文，徐梓又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钱海岳《南明史·诸王传/表》结合明史诸本、南明史籍，大体勾勒出明宗室在北京陷没后的行径，是研究明宗室活动不可或缺的辅助工具。但是由于资料的选取和信息的甄别是该著的特点，加上历史人物的记载容易受作者的主观判断而刻意被选择某一种“可能”，这就给以后的研究带来一系列障碍。因此有必要对该书进行考证以求信实。现根据相关史料和学界对明宗室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校和提疑，挖掘出20例补漏之处和笔者的解释以供学界参考。

关键词：《南明史》；《诸王传/表》；补正；世袭表

中图分类号：K24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666(2021)03-0041-10

学界对张廷玉所撰之《明史》关注颇多，而对明末的史料则缺乏一定细究，这给与笔者能再次从《南明史》中发现诸多问题的机会。笔者曾经初步对《南明史·诸王传/表》的内容提疑，发掘出32个实质性问题，现复从本著的《诸王传/表》中挖掘出18个饶有争议的词句，并对部分疑问作出自己的看法。本文作为针对《南明史》的第二篇考据文章，主要从该书所记载的宗室袭封背景和世袭出发，结合《明史》（点校本）、《小腆纪传》、《明实录》、《燭火录》等文献，对与原文献有出入、缺漏、歧义的地方提出疑问并作出笔者自己的解释，以做到抛砖引玉之效，如校正不当，还望方家予以指正。

1. (李)自成请自裁，(福王朱)常洵叱曰：“任汝杀我！”遂共缢杀之。(卷26《孝皇帝常洵传》，第1404页)

一般而言，明末士大夫在痛恨家国破灭的现实的同时，又对舍生取义的士绅官僚和殉国的中上层阶层极力描绘，《崇祯朝野纪》的作者称农民军进入洛阳后，想拥戴福王，福王大骂不可，被要求自裁，福王言“任汝杀我”，农民军于是缢杀之^{[1]134}，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对福王之死加以部分掩饰，称福王被抓回后受农民军逼迫，福王“闭目摇首不语，已而大骂，遂遇害”^{[2]179}，以此来突显福王不为农民军的威逼所屈服的坚毅品格。

而持与之截然相反看法的学者主要以入清为官者为主，他们认为福王是一名贪生怕死的藩王。顾诚先生十分赞同这种看法，他的《南明史》一书对农民军敢于反对封建统治集团这一做法表示肯定，认为明朝封建统治者是与下层人民相作对的腐败集团，而同样作为封建腐败产物的

收稿日期：2020-01-19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明代开国功臣家族研究”（18WT59）

作者简介：王浩淼（1994—），男，江苏无锡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政治史；朱忠文（1988—），男，河南信阳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明清政治史；徐梓又（1993—），男，四川眉山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俗史。

明诸王更是“极端不合理的丑恶现实”的代表，因此在描绘福王朱常洵被杀时，往往极力表现出他们的丑陋面貌：“朱常洵向吕维祺大叫：‘吕先生救我！’”“贪生怕死的朱常洵一带到李自成面前即吓破了胆”。顾先生认为部分史籍没有记载福王的怯懦表现主要是想“竭力加以掩饰”^{[3]132-133}。谷应泰的《明纪事本末》也记载了福王的庸怯，“王见自成色怖，泥首乞命，自成责数其失，遂遇害”^{[4]1341}，《国榷》云“王色怖，泥首乞命，自成责数其失，遂弑之”^{[5]5886}，《石匱书后编》^{[6]25}和《烈皇小识》^{[7]190}大体与之同。而《明史》则对福王之死的描绘采取简化，很可能是同样作为集权王朝的清朝，想抹去农民军对地主阶级的反抗行径和地主阶级的羞辱行为。

我们可以根据当时的情形大致揣摩在文集中对同一事件出现不同记载的原因，《明季北略》言“福王募死士力战，斩获颇多”，未言福王临死时怯懦表现，且言“士民被杀者数十万”^{[8]292}，部分内容与诸本略微不同，但是计六奇在后面补充了兵科张缙彦、吏科章正宸、兵部尚书陈新甲对李自成陷河南的看法，他们将明末剿贼的败亡原因指向于督师杨嗣昌的无能，明末士大夫很可能故意将福王的殉国表现得十分出彩，将河南的陷没描绘得可歌可泣，而其目的却别有所指，即出于对自身地位的考虑，他们不可能将剿寇失败的内部原因归结于自身和君主及其同一血脉的皇族身上，而需要一个替罪羊。

笔者认为，福王在首日缒城出逃至迎恩寺的行为就可以看出他是一名懦弱的藩王，如果次日他被抓回后却能够保守自己的节操，这是很难得，也是很不可思议的结局，但是我们细数被李自成俘虏的藩王中，没有一个不哀首乞命，妄图假借背叛自己的地主身份以图活命。福王在洛阳府中“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9]3650}，又怎么可能因农民军要拥戴或要杀他而大骂不屈呢？再者，农民军最痛恨的对象之一就是占据大量民田资财的地主藩王勋戚，乃至宦官，他们斗争的主要目标就是以勋贵藩王为首的明朝权贵阶级，一旦成功攻取重镇，立即杀之以泄愤，或者拷掠资财，但同时也要向自己的首领汇报。按照农民军在秦晋豫一带的行为，从降晋王、秦王和

杀唐王、肃王、代王的案例可知，当手握大量土地资财的明藩王所在的地区一旦成为农民军下一个争夺的目标时，李自成必然亲自压阵，一般情况下会以诛杀藩王以泄恨的手段作为战事的结束。最后，农民军也不可能因为腐败的福王是先皇（明神宗）之子而要拥戴他，这是违背农民军举兵起义的根本意愿，而且在当时条件下也是不容许发生的。部分史册之所以将福王临死时的品质抬得过高，一方面是这些遗老将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于杨嗣昌的无作为，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保全明末地主乡绅的脸面而考虑的，他们想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地位和维护封建纲常伦理，在他们的理念中，统治阶层不能有卑躬屈膝的行为，一切战争出现的罪恶都是起义军无恶不作引发的后果。但是《南明史》作为一部后世写前世的文献，应该从公正的角度予以论证说明，而不能承袭前代部分文献中的主观性评价以致成为后世研究的障碍，因此原文应改为：“王见（李）自成色怖，泥首乞命，自成责数其失，遂遇害。”

2. 秦王存枢，秦肃王谊湫子，太祖十一世孙，万历十五年袭封。（卷27《秦王存枢传》第1431页）

《明史·诸王世表》言“□王谊湫，靖嫡三子…十五年进封”，“存枢，谊湫子，万历年袭封”；《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四十五言“（派遣）礼部题右春坊右中允吴宗达册秦府秦世子存枢并妃张氏”^{[10]10346}。由此可知，朱存枢是在万历四十四年五月被册封为秦世子。原文所言之“万历十五年袭封”是朱存枢的父亲秦肃王朱谊湫袭爵的时间，故原文“万历十五年袭封”应是“万历四十四年袭封世子”。1978年在陕西西安出土了《大明秦世子暨妃张氏合葬墓志》，学者梁志胜等根据该墓志认为朱存枢已于“崇祯二年三月初五日以疾薨逝”。根据《明神宗实录》卷四百六十五曾谈到万历三十七年，秦肃王想封长子朱存枢为郡王，礼部认为秦肃王是由中尉跨支袭爵，其非嫡长子者应以原爵，朱存枢何况是庶子，要求秦王“仍谕本藩恪遵明例毋再妄请不报”^{[10]8776-8777}，可知此时朱谊湫仍在世，朱存枢是庶子，卷五百三十九言“准秦王谊湫庶一子存枢封为世子，选张氏封妃”^{[10]10241}，此前朱谊湫

多次请求册封朱存枢为郡王都被礼部否决，而在万历四十四年被封为世子可以理解为朱存枢的嫡母年满五十而无嫡子，以庶长子为世子，其父亲在熹宗时又请求册封另四子，说明圻志不缪，朱谊漑应薨于崇祯年间，而《明史》所承袭的王鸿绪《明史稿》犹豫于两本实录之间的矛盾而做了省笔。学者梁志胜又根据《大明宗室秦景王墓志》、《陕西通志》（康熙年修）以及满清史料内的“朱顺吉”相互印证得：世子朱存枢（未袭秦

王爵）薨于崇祯二年三月，同年九月其次弟（景王）朱存机被册封为秦世子，崇祯十二年封秦王（《通志》云“崇祯十年”），十四年二月薨，谥曰“景”，无子，次弟朱存极于同年袭封（同年袭封似乎可疑，暂且不改），十六年为贼所执，十七年入清^[11]。因此原文应改为：“秦王存极，秦肃王谊漑子，太祖十一世孙，崇祯十四年袭封。”

表1 秦王世袭表（部分）^①

秦王府世袭信息	
肃王谊漑，靖嫡三子，万历十三年袭封镇国将军，十四年加封紫阳王，十五年进封秦王，崇祯年间薨。	
景王存机，肃庶二子。 崇祯二年封世子，十二年袭封，十四年薨。	□王存极，肃庶三子。 崇祯十四年袭封，十六年为贼所执。

3. 晋王求桂，晋穆王敏淳子，太祖十一世孙，万历四十一年袭封。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入太原，降。随至京师。自成败，间亡吴三桂军，降清。表同传。（卷27《晋王求桂传》，第1432页）

按《明史》及诸文献皆认为晋王朱求桂“陷于贼”，“不知所终”，“降于清”，学者刘毅通过对《清实录》和《晋裕王墓志铭》等信息考证

后认为，朱求桂在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袭爵，食禄十七年，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十一月薨，谥曰“裕”，五年八月下葬。陷于农民军者为朱求桂之子朱审烜，这在《清实录》有明确记载^[12]。由此可得，此处应记：晋王审烜，晋裕王求桂子，太祖十二世孙，崇祯年间（崇祯六年以后）袭封。

表2 晋王世袭表（部分）

晋王府世袭信息	
穆王敏淳	
裕王求桂，万历四十一年袭封，崇祯三年薨。	
□王审烜，崇祯年间袭封。十七年降清。	

4. 周王恭枏，周端王肃濬子，太祖十一世孙，万历四十七年袭封。（卷27《周王恭枏传》，第1434页）

按孙凯通过考证《皇明谕葬周端王暨元配李氏合葬圻志文》后认为，周端王薨于崇祯八年^{[13]191}。如果没有其他确切证据可以推翻圻志信息的话，那么朱恭枏袭周王爵应在崇祯八年至十五年间的，而不是万历四十七年了。

5. 敏浮，庆成中尉。兄敏濛，镇国将军，死（李）自成兵。（卷27《周王恭枏传》，第1434页）

按明朝宗法制要求，亲、郡王除继承者袭爵外，其余诸子降爵，即同一支小宗（郡王以下支系）的同一辈（可根据字辈算）应是同等爵位，即朱敏濛是朱敏浮的（同父）兄弟，他们应该是同一爵位，此时二人地位有差异。究其错讹之处有两种可能：第一，中尉和将军有一处错误，朱敏浮举于乡成为举人，按明末参加科举并授官者多为中尉（参加科举后爵位会被革除），因此中尉更符合他的身份，故如果是二人是亲兄弟，那么朱敏濛就不会是镇国将军，而是中尉；第二，朱敏浮是中尉，由于具体没说是哪一品级的中

尉，因此可以圈定是镇国中尉到奉国中尉，当朱敏浮是镇国中尉，他与朱敏濂就会共同有一个作为郡王的高祖，即与镇国将军的朱敏濂的关系至少是从高祖兄弟行。本句摘自徐鼐的《小腆纪传》卷九，其言“敏濂，字龙泽，晋藩，庆成府镇国将军，太祖十世孙也。闯贼之乱，骂贼死。中尉敏浮，盖其兄弟行，顾炎武访之汾州阳城里”^{[14]109}，从此句我们可以体会到，原文的“兄”至少表示“从高祖兄”。

6. 内乡王在鑿，内乡王朝鑿子，太祖九世孙，万历二十九年袭封；应城王肃落，应城王在錠子，万历二十二年袭封；阳信王弘福，阳信王以澍子，万历四十三年袭封；蜀王至澍，蜀恭王奉铨子，太祖十世孙，万历四十四年袭封；建安王统鑾，建安王谋壘子，太祖九世孙，万历四十五年袭封，弘光未薨；善化王禔，善化王企子，万历三十六年袭封，居贵阳；祁阳王禔，祁阳王企子，万历四十五年袭封；南乐王常汰，南乐王翊子，万历三十年袭封；樊山王常沧，樊山王翊子，仁宗八世孙，万历三十三年袭封；高安王常淇，高安王翊子，万历三十四年袭封；延津王常滄，延津王翊子，万历四十三年袭封；铜陵王由榭，铜陵王常派子，万历二十九年袭封。（卷27《周王恭枵传》，第1435页、1437页；阳信王事见卷27《滋阳王弘懋传》，第1451页；蜀王事见《蜀王至澍传》，第1451页；建安王事见《翼王议泐传》，第1463页；善化、祁阳二王见《岷王禔澍传》，第1474页；南乐王事见《赵王由棧》，第1485页；樊山王事见《荆王某传》，第1486页；高安王事见《淮王常清传》，第1488页；延津王事见《惠王常滄传》，第1491页。）

按《明史·诸王世表》载“□□王在鑿，朝鑿嫡一子，万历二十九年封长子，继而袭封”和“□□王肃落，在錠嫡一子，万历二十二年封长子，继而袭封”等记载，钱先生将“继而袭封”直接认定为“袭封”，《明熹宗实录（梁本）》卷三十八言“（天启四年六月）敕存问应城王在錠齿德，并旌其子肃落”可知朱在錠于天启初年仍在世^{[15]2383}，应城世子“袭封”之事并非确事，

以此类推，所列举案例中但凡涉及具体袭封王爵的时间皆是封长子或世子的时间。因此记载中的“袭封”应改为“封长子（阳信长子、蜀世子、建安长子、善化长孙、祁阳曾长孙、南乐长子、樊山长子、高安长子、延津长子、铜陵长子），不久袭封”。

7. 颍川王在鑿，颍川王在鑿子，万历三十九年袭。（卷27《周王恭枵传》，第1436页）

按周府字辈顺序为“有子同安睦，勤朝在肃恭，绍伦敷惠润，昭格广登庸”。《明史·诸王世表》中颍川王府世袭有“□□王朝壘”“□□王在鑿，朝壘嫡一子，万历三十九年封长子，继而袭封”，前后二王是父子关系，字辈不能相同，“在壘”应是“朝壘”之讹，“万历三十九年袭”应改为：“万历三十九年封长子，不久袭封。”

8. 堵阳王在鑿，堵阳恭懿王朝壘子，万历四十年袭封。（卷27《周王恭枵传》，第1436页）

按孙凯在《明代周藩王陵调查与研究》考证得堵阳恭懿王朱在鑿应该在万历四十七年袭封堵阳王^{[13]203}，此处“四十年”应改为“四十七年”。

9. 奉新王某，奉新王在鑿子，不知何年袭…朝遠，恭僖王勤棚子，不知何年袭。表同传。（卷27《周王恭枵传》，第1437页）

按根据《明熹宗实录（梁本）》卷四十三记载“遣使各藩，册荣府仁和王由榕、咸宁王由榕、惠安王常澍、周府奉新王肃滋、代府吉阳王鼎金”^{[15]2397}，可知奉新王在鑿去世后，其子朱肃滋在天启四年袭封，那么《南明史》所说的奉新王应该就是朱肃滋，由于本书所说的奉新王事迹已经延续到隆武帝时期，因此也可能是朱肃滋的弟弟或者儿子。根据周府至少有十一位郡王从河南南奔至长江以南地区，占全部周府藩王的三成比重，因此我们认为隆武时期的奉新王是朱肃滋的可能性极大，如果是朱肃滋，则袭爵时间可以确定。

按根据周府字辈和五行的结合，“勤”辈应和“火”旁相配，再者《明史·诸王世表》载周府奉新恭僖王为朱勤滅而非朱勤棚^{[9]2588}，因

此原文中的“棚”字当为“熾”字之讹。

表3 周府奉新王世袭表（部分）

奉新王本支信息	朱朝遼支信息
<p>荣宪王睦榴（《名山藏》卷三六作“朱睦榴”）</p> <p>恭僖王勤熾</p> <p>庄靖王朝挺</p> <p>□□王在錄，庄靖王庶一子。万历三十三年袭封（《明史》作“万历三十二年袭封”，《明神宗实录》卷四百八记载“（三十三年四月）册封奉新王朝挺庶一子在錄为奉新王”^{[10]7619-7620}，四十四年薨。</p> <p>□□王肃滋，在錄□一子。天启四年袭封，隆武二年薨。（存疑）</p>	<p>□□王朝遼，永历年间封。三十七年降于清。</p>

10. 诸营俱溃，独兴化土司迎奉国将军晖奎入寨，以兵千人拒守。（卷27《楚王华奎传》，第1442页）

本句摘自《小腆纪传》卷九，其言“诸营俱溃，独兴化土司迎奉国将军晖奎入寨，以兵千人拒守。寨破，晖奎死之”^{[14]109}。查明诸王拟名中无“晖”字辈，只有肃府第十三代有“晖”字辈，且属于太祖的第 $5n+3$ （ n 为自然数）世孙，与“土”行相合，故“奎”字符合，且原句也说明了朱晖奎是肃府奉国将军，说明肃王朱识鋌很可能有子被破例晋封郡王，其孙恰好为奉国将军。按照《明史·诸王世表》言明代帝系才延续到“由”字辈，在其他王府中字辈一般也不超过十一代^{[9]2505}，因此有人认为明末出现超过太祖第十一代的后裔很可能是伪造身份者。按周王世袭中，朱恭枵死后，其孙朱伦奎自浙江转江西，后南逃，与世子同死于隆武二年的广州之变，朱伦奎即为太祖十三世孙，其世子为十四世孙，肃府与此不同，周府整体生子较早，我们假设朱识鋌（宪王嫡子）在万历四十二年封世子，为10岁，则到永历元年也才四十余岁，又如何有三世孙？即使朱识鋌于崇祯十六年的年龄为七十，也很难有重孙，这就需要处于西北的肃府每代在17岁生子，何况又要保证“朱晖奎”在永历二年已为弱冠。笔者推测该奉国将军应是肃府“绅”字辈，肃府早期独庶子承袭现象严重，至恭王时始嫡子承袭，且另有五名余子封郡王，恭王四世孙即“绅”字辈，符合余子（郡王）之三世孙奉

国将军的爵位承袭顺序，而徐鼐仅凭五行偏旁而误会了字辈。仍存疑。

11. 盛泚，字宇三，楚王裔，崇祯十五年举于乡，隐于诗酒。（卷27《荥阳王蕴钤传》，第1447页）

按清康熙本《武昌府志》^{[16]271}和四库本《湖广通志》^{[17]379}的“举人”条均有“朱盛泚（《湖广通志》作“泚”，查无此字，该本后于《武昌府志》，现以《武昌府志》为准）”而无“朱盛泚”，“泚”曾作为“演”字的简化字，后来不再使用；而“泚”有两意，zhu表停聚和明净，ning表烂泥、泥泚和泥浆粘着之意，二字不互通^{[18]533,536,578}。一种理解是钱先生或其所采用文献的作者可能自小受清朝避讳文化的影响，由于清宣宗皇帝名“旻宁”、文宗皇帝名“奕訢”，故文献中不可直书“宁”，钱先生遂将“宁”字幻化，遂有此故，又“泚”“泚”有时相通，遂仿写，但在本著的岷府祁阳王朱裡泚传记中的“泚”字却未被改写，其很可能是钱先生所用之文献使用了避讳手法而在另一篇未使用，当然也可能是钱先生遗稿字迹难辨，后人抄录有误。故原文“泚”应改为“泚”。

崇祯十五年壬午科，还有一位楚宗人朱容楨也中了乡举，可补于朱盛泚后。

12. 寿鏞，字桂林，鲁恭王颺坦子，崇祯中，官临南通判，有声绩。（卷27《滋阳王弘懋传》，第1451页）

诸文献皆未直言朱寿鏞是鲁恭王之子，不知

钱海岳先生从何处摘抄而来。第一，鲁恭王薨于万历二十二年，诸子弱冠即可封郡王，在《明史·诸王世表》中，恭王庶十二子朱寿钜在万历十八年就被册封为永福王，如果朱寿**鏊**年龄更小，是恭王的遗腹子，那么在万历三十七年左右就应该被封为郡王，然而在所有史料中没有说明这点，当然也可能是恭王媵妾之子。第二，万历十八年，明朝廷对开科的宗室仅限于“名粮诸宗和无名粮庶宗”^{[10]4165}，当时在明文上正式规定允许宗室开科，万历二十一年许“奉国中尉内有不遵授封者，准停禄，听入学应举，照出身资格授官，罢闲后不得重封”^{[10]4956}。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朝廷听从李廷机言，许将军、镇国、辅国中尉以下的宗室可以与生员一体应试，但不得除京官。尽管如此，但是在案例中应举者多是中尉爵位者，按照宗法制，除去旁支承封案例外，亲王之子将是郡王，是不大可能被允许科举入仕。文献中虽未明说朱寿**鏊**是靠科举入仕而做到临安通判，但是明末不可能让宗室依托恩荫、军功、世选等方式入仕，因此他唯有靠宗举或科举才能获得官职，而宗举者不可能为地方官，多为宗正等管理性职位，科举又不可能让郡王参与，除非他是恭王媵妾、媵妾之子而无爵位，但是在所有文献中并没有记载除朱寿**鏊**等八人以外的恭王之子。第三，如果作为鲁王朱以海血脉较亲近的宗室，又怎么会一开始就跟从唐王朱聿键，且唐王（《明史》卷116言永明王使募兵于云南）还如此重用他，并派遣他安抚云南而无忌惮其与鲁王相通。第四，南明史籍只言朱寿**鏊**为宗室，《小腆纪传》卷九《朱寿**鏊**传》提及了他的家世背景，可是作者徐燾只认为朱寿**鏊**是“鲁藩裔，家兖州”^{[14]110}，并没有明确说是鲁恭王之子；《明季北略》云“时隆武差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朱寿琳率总兵孔思诚、副总兵孙守约、监纪通判张京元驻札曲靖”^{[19]465}。《滇南纪略》云：“孙可望入云南。巡抚都御史罗国瓛、宗室朱寿琳死之”^{[20]36}。由此可得，我们无法确定朱寿**鏊**是鲁恭王亲子，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是鲁府宗室，原文应当衍“鲁恭王颺坦子”。

关于担任云南通判一事，摘自《小腆纪传》卷九《朱寿**鏊**传》，根据原文可知崇祯年间朱寿

鏊一直留于云南，其所任临安通判指代云南临安府通判，清雍正《临安府志》卷十一《秩官志·通判》^[21]及《新纂云南通志》卷十二《历代职官表一·临安府通判》^{[22]578}下均无山东兖州宗室“朱寿**鏊**”，而有江西宗室“朱统燧”。又考察云南其他县志情况，里面涉及到的明朝宗室有：云南府宜良县知县朱统奎，豫章人，天启朝时任^{[22]564}；潞江府、临安府通判朱统燧，江西人，崇祯朝时任^{[22]588}；楚雄府同知、黑盐井提举司朱奉镶，成都人，崇祯时任^{[22]598}；楚雄府广通县知县朱统**鏊**，新建人，崇祯时任^{[22]598}；镇南州知州朱谋理，宁州人，崇祯时任^{[22]601}；姚安府姚安县知县朱统**鏊**（疑是**鏊**，因讳而衍），江西人，崇祯时人^{[22]601}；大理府浪穹县知县朱蕴璞，湖广人，崇祯时任^{[22]610}，均非指明是鲁府的朱寿**鏊**，也许朱寿**鏊**是在崇祯十七年授职而未有正式命令下达。另外朱保炯所编撰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自天启二年至崇祯十六年八次殿试以及《乾隆兖州府志》卷十五《选举志》均无“朱寿**鏊**”^{[23]2598-2625}。因此“崇祯中，官临安通判”一事需存疑。

13. 华阳王至德，字敬一，华阳安惠王奉觥子，万历四十三年袭封。表同传。（卷27《蜀王至澍传》，第1452页）

按《明史·诸王世表》中也载有“□□王至德”，学者梁曼容通过比较《明熹宗实录》《韵谭》及《明史》其他版本总结得“至德”是“至澍”之讹^[24]。

14. 补瑞昌王世袭

按钱先生记载瑞昌王朱议泐事迹，言其隆武二年九月攻打清江宁府失败，不久在镇江被俘，执至南京，于十月遇害。《清史稿》也有类似说法，顺治三年九月己酉，“故明瑞昌王朱谊泐谋攻江宁，官兵讨斩之”，^{[25]103}，似乎可以确定在朱议泐死于顺治三年的十月份。其子在永历元年（顺治四年）十二月袭瑞昌王爵，父子两人在爵之间有14个月的空白期。《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35言“江西巡抚章于天奏报：东安县逆寇平，擒伪瑞昌王朱统**鏊**。得旨朱统**鏊**着正法”^{[26]285}，正好吻合在这14个月之内。朱统**鏊**实际上就是朱统**鏊**，本著有传，在传记中，他为清江西巡抚

章于天所获，自称“我帝室藩王，岂为所辱”^{[27]1465}。章于天本人极度贪鄙，该奏报可能目的在于称功，但是通过将文献相互结合起来看事件的连续性，似乎说明了朱统𣎵的瑞昌王身份是被广泛认可的，他可能是南明永历朝事后追封，也可能是当朱议泐牺牲后即自封或被永历朝廷册

封，不管怎样，清廷和南明朝廷双方似乎都认可了他的“藩王”地位。朱统𣎵死后，永历朝随即册封朱议泐之子为瑞昌王也就顺理成章了，南明朝廷册封藩王不仅看中嫡长子的继承，同样也看中过世藩王有能力且年长的兄弟，即立长（先兄弟后嫡长子）原则。

表4 宁府瑞昌王世袭表（部分）

瑞昌王本支信息	朱议泐支信息	朱统𣎵支信息
□□王拱楫。弘治十二年袭封。正德十五年坐宁王朱宸濠反死，子送凤阳，国除。		
某		□□王统𣎵，隆武二年十一月封，永历元年遇害。
某	□□王议泐，隆武二年五月封。十月遇害。	
议泐，隆武二年二月封。五月改封翼王。	□□王中□，永历元年十二月袭封，十五年七月薨。	

15. 东垣王常洁，东垣恭懿王翊铠子，崇祯八年袭封。（卷28《郑王常澄传》，第1485页）

按《明史·郑靖王瞻埈》言郑恭王世子载堉“痛父非罪见系”，请将郑王爵让予曾祖父兄之曾孙盟津王裔的朱载璽，朝廷许之，“而令载堉及翊锡以世子、世孙禄终其身，子孙仍封东垣王”^{[9]2859-2860}，《明史·诸王世表》将载堉次子朱翊钦嫡一子朱常洁列于东垣王府系后，《明神宗实录》言记载了东垣王朱常灏极力反对本支将爵位让予朱载堉，“上疏诋载堉为大奸异行”^{[10]7970-7971}，《国榷》卷九四亦称“郑府辅国将军常洁袭东垣王，盖郑端清世子载堉之嫡次孙也。载堉子二，翊锡、翊钦，而常洁即翊钦子”^{[28]5695}。学者李鹏飞根据《拟山园选集》卷四七《朱公竹斋传》证明是“朱翊钦”而非“朱翊铠”^[29]，由此可得朱常洁非东垣恭懿王朱翊铠子，而是端清世子朱载堉次子朱翊钦嫡一子。

16. 德王由栎，纪城温裕王常澍子，王由侏弟，英宗七世孙。崇祯十二年，清兵陷济南，德王由枢被执薨。十三年六月，由栎袭封。（卷28《德王由栎传》，第1488页）

按《明史》记载，德定王去世后，由于世子广宗王朱由榘早卒，庶二子朱由枢按伦序袭爵，

并死于崇祯十二年的济南劫难，此后德府世系不明。《历城县治》（崇祯十三年修）记载“（德）嗣王，端王（定王子朱常灏）子，俭朴好佛，崇祯己卯蒙难，嗣子六岁殇，上命纪城府进爵为德王，庚辰六月十六日册封”^{[30]175-176}，李晋华先生根据明清档案的一些资料认为，明朝德嗣王应当是朱由榘，端王庶六子，万历四十三年被册封为世子，他并没有过早去世，在崇祯八年袭封德王，李先生同时认为在玉牒中压根不存在朱由枢这一个人^[31]。学者王欣根据李先生的结论结合清朝各类文献进一步论证出：朱由榘于崇祯十二年被满清送入北方并死于关外。济南由于德府无直系宗室，按伦序由纪城王朱祐棨子朱慈炆承袭。而朱慈炆两个哥哥纪城王朱慈颖（纪城王朱由侏庶长子早夭，朱慈颖是其庶二子）、奉国将军朱慈黨（朱由侏庶三子）已和德王朱由榘同时被清军北执。朱慈炆在崇祯十七年被农民军俘虏^[32]。此后山东的德府宗室在清招抚使王鳌永的招抚下相继投降^{[33]408}。这一系列事件和世袭变迁在山东巡按朱朗鏞的奏本都叙述的一清二楚^{[34]98}，也印证了《明史·诸王世表》中只提及朱由枢封郡王事而无实际郡王名的模糊记载^{[9]2904-2905}，因此当无大错。但是学者们均没有

回答为什么清朝史官会记载有“朱由枢”而忽视了“朱由栳”？此外“朱由栳”这一人物信息来源于何处，目前也不得而知，所谓的德王朱由栳既然不是纪城温裕王朱常澍之子，说明他有可能是假借了某个人的身份，而朱由栳的三子也被证明有两子被俘，一子继承德王，并于崇祯十七年被李自成部将郭升掳走，在当年六月清军复来山东，以德王（或摄德府事）为首的宗室采取投降措施，这时候的德王（或摄德府事）又会是谁呢？笔者认为如果“朱由栳”未在任何文献中出现，仅靠王鳌永的奏疏得到德、泰安王府的信息，那么朱由栳很可能就是泰安王朱由栳，其本身可能在崇祯年间从摄泰安府宗室（本支已断）进封为王，济南为农民军攻破后诸王四散，泰安王因为地位较高而受公举一致认同得以摄德府事，王鳌永作“槩”，栳的繁体字“櫟”与“木+槩”十分相似，钱先生可能根据一些文献关于在济南降清时出降的宗室主要代表朱由栳信息和对字形的误判，把一个人分成了两个身份，分别成了德府首领德王和泰安王，并将这个结果向前推移到明亡以前并续接崇祯十二年以后的世系，我们可以揣摩《南明史·泰安王传》中的“与”和王鳌永奏疏中的“率领”的区别。第二种猜测为，如果钱海岳先生确实依据了某本史书中“朱由栳”的信息，笔者认为朱由栳可能是另一种身

份，就是嘉祥王，降清时有“嘉祥王常注孙慈药、清平王由梟子慈葑”^[27]¹⁴⁸⁹，而王鳌永奏疏亦称嘉祥王子慈药，可见嘉祥端庄王之子是存在的，虽然朱朗鏞和王鳌永都称他为“嘉祥王”，但他可能只是世子就去世了而被追封为郡王，由于德王慈炆被掳走，德府面临贼走清来的危机时刻却群龙无首，据朱朗鏞奏，德府在降清后曾进行公举，一致请求清廷认可“嘉祥王子慈药宜继国统，奉香火以光庙貌”一事，所以在此之前，即出降清朝时的代表应该除了年长且地位崇高的泰安王朱由栳（可能是摄泰安府宗室）作为辅助外，还有按宗法制拥有较近血缘并已管理王府事务的嘉祥王子（或孙）朱慈药（王鳌永奏疏中投降宗室以泰安王为首，次即为朱慈药），并且在投降时很可能是以故嘉祥王（或世子）朱由栳子朱慈药为名义，只是降清后清廷为限制明宗室权力而不认可朱慈药的身份，因而朱慈药的身份很快被抛弃，其父“朱由栳”以本不存在的身份反而成为某些史书山东宗室反农民军、反清、受清迫害的重要代表。现根据学者王欣所考证出较为有根据的结论更改原文：“德王慈炆，纪城王由栳庶四子。崇祯十二年，清兵陷济南，王由栳被执，薨。次年六月，慈炆袭封。”并整理出以下世袭表（部分）：

表5 德王府世袭表（部分）

德王府世袭信息	纪城王府世袭信息	嘉祥王府世袭信息
定王翊鎔		
端王常澍，定嫡一子，万历十九年袭封，崇祯五年薨。	温裕王常澍，（德）定嫡三子。	端庄王常注（“溢”见《山东巡按朱朗鏞启本》），（德）定嫡四子。
□王由栳，端庶六子。万历三十六年封广宗王，四十三年进封世子，崇祯八年袭封德王，十二年被清军俘虏北上，十五年卒于关外。一子早夭。	□□王由栳，温裕嫡一子。万历二十二年封长子，三十七年袭封。薨。	□□王由栳（笔者第二种想法，存疑）
□王慈炆，纪城王朱由栳庶四子。崇祯十三年进封德王，是年被李自成部将郭升掳走，不知所终。	□□慈葑，由栳庶二子。袭封，崇祯十二年被清军俘虏北上。	慈药

17. 郟西王常潮，郟西王常湖弟，宪宗五世孙，不知何所袭；弟常濬官总兵。（《益王慈烺传》，第1494-1495页）

按郟西王朱常湖是益宣王的庶十三子，如果朱常潮是朱常湖的同父兄弟，那么为何不直接被赐予郡王爵而要袭封兄弟的爵位，这似乎不合乎

常理。《明清档案》第一辑第二册收录了闽浙总督陈锦上报攻克建宁的奏章，其称“于四月初四日寅时，业已攻克登（建宁）城，逆魁伪郟西王朱常湖、伪国师王祁，以及伪军门、伪总兵等犯...”^{[35]151}，与本著关于王祁与郟西王俱入古田，起兵复建宁等记载合，此处清廷关于郟西王的记载是朱常湖而非朱常潮，但不排除辑本的人为删改。根据《益宣王朱翊钊圻志》载，宣王有子十八人，有益世子朱常灏、黎丘庄懿王朱常溱、郟西王朱常湖、丰城王朱常漪等十七王，长子早卒而不知名讳，但无朱常潮，可见朱常潮与益宣王无直接的血缘联系^{[36]521-526}。该档案又言郟西王亲弟朱常溱事，其来源于陈锦在顺治六年所奏《为塘报连复两县搜获原失县学印信擒斩巨逆削平贼寨事》^{[35]180-181}，考虑到益府直系亲属断不会有“朱常溱”。按益府家谱，朱常潮与朱常溱都是阜平王府的普通辅国将军，阜平懿简王孙，前者是阜平王朱翊钊子，后者是镇国将军朱翊銜子，与朱常湖为从曾祖兄弟关系，血缘已远。结合“亲弟朱常溱”的推论，原文的郟西王应当是朱常潮，始封王朱常湖去世，王爵久空，隆武帝于是立益府

疏族阜平王府宗室为新王，因此原文中的“弟”皆非亲弟。另外朱常溱应排版于阜平王由樽后。

笔者曾在《钱海岳〈南明史·诸王传/表〉补证》一文中对所列28处关于宗室信息错误记载的出现作了解释，即承袭错误、原文献的误导、缺乏佐证的精神、工具和方法以及字词的误用^[37]。本文从宗室的身份出发进行考证，复发掘出17例实质性问题，从中发现钱海岳先生对“寻袭封”和“袭封”缺乏仔细校正，即字词的误用在本文所举出的案例中占多数，而原始资料的疏漏是主因。《明神宗实录》《明熹宗实录》和《崇祯实录》《崇祯长编》等一手史料未承袭之前实录所拥有之详实的特点，尤其在藩王的承袭事件、谥号、名讳甚至齿序问题上出现严重的信息空白，这些问题被不断沿用，以至于错误的传抄愈发严重，钱先生撰写《南明史》正是遇到这种信息空白而误会原意。介于笔者的能力不足，对于有极高史料价值的《南明史》，笔者只能做到表面的考证而不能提出创新性的建议。

注 释：

①由于《南明史·诸王世表》较为简陋，本文世袭表主要格式和内容采自《明史》，再经过笔者整理和更正，本表皆适用于《南明史》和《明史》，方面读者阅读和校对。下同。

参考文献：

- [1]李逊之. 崇祯朝野纪[M]//台湾文献丛刊250种. 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
- [2]吴伟业. 绥寇纪略附补遗[M]//丛书集成初编. 台北:商务印书馆,1937.
- [3]顾诚. 明末农民战争[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 [4]谷应泰. 明纪事本末[M]. 北京:中华书局,2015.
- [5]谈迁. 国榷[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 [6]张岱. 石匮书后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7]文秉. 烈皇小识[M]. 台北:广文书局,1967.
- [8]计六奇. 明季北略[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9]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0]张惟贤,叶向高,刘一爆,等. 明神宗实录[Z]. 校印本.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11]梁志胜,王浩远. 明末秦藩世系考[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118-124.
- [12]刘毅. 《明史·诸王传》补正[J]. 南开学报,1997(2):74-80.
- [13]孙凯. 明代周藩王陵调查与研究[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
- [14]徐鼐. 小腆纪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 [15]温体仁,张至发,张贞运,等. 明熹宗实录[Z]. 校印本.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16]裴天锡,罗人龙. 武昌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集:第2册,康熙三十四年朱昌绪补刻本. 南京:江

苏古籍出版社,2001.

- [17] 迈柱,夏力恕. 湖广通志[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32册.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 [18] 冷玉龙,韦一心. 中华字海[Z]. 北京:中华书局,1994.
- [19] 计六奇. 明季南略[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20] 佚名. 滇南纪略[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 [21] 张无咎,夏冕. 临安府志(雍正)[M]. 民国刻本.
- [22] 赵式铭,秦光玉. 新纂云南通志[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 [23] 朱保炯,谢沛霖.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24] 梁曼容. 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诸王世表》正误[J]. 古代文明,2015(2):91-114.
- [25] 赵尔巽. 清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6]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Z].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7] 钱海岳. 南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2016.
- [28] 谈迁. 国榷[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 [29] 李鹏飞. 《明史·诸王世表四》郑藩世表疑误考正[M].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7(3):71-73.
- [30] 北京大学图书馆编. 历城县治(崇祯十三年修)[M]. 民国二十九年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 [31] 李晋华. 明史德王府世系表订误[M]//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第二分册.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8.
- [32] 王欣. 明德王府末代王补证[J]. 清史论丛,2015(2):303-311.
- [33]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M]. “中央研究院”影印本,1986.
- [34]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M]. “中央研究院”影印本,1986.
- [35] 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 台湾明清档案汇编·第一辑第二册[M]. 香港:道流出版社,2004.
- [36] 益宣王朱翊钊圻志[Z]//江西出土墓志选编.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 [37] 王浩森,陈金凤. 钱海岳《南明史·诸王传表》补证[J].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12-19.

Supplement and Revision of Qian Haiyue's *The History of the Nanming Dynasty: Kings' Biographies / Tables*

WANG Haomiao, ZHU Zhongwen, XU Ziyou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Mr. Qian Haiyue's *The History of the Nanming Dynasty: Kings' Biographies / Tables* combined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or many historical books and documents of the southern Ming dynasty, which generally described the situation of Ming's imperial clan is the indispensable auxiliary tool to research the activities of Ming's imperial clan. However, due to the selection of data and the discrimination of information, the records of historical figures are easy to be subject to the author's subjective judgment, even deliberately to choose a "possible", which brings a series of obstacles to future research, so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Textual research to excavate the real. According to relevant historical data and academic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imperial clan of Ming dynasty, this paper raises the doubts, excavates 20 cases of leakage and gives the author's explanation for academic reference.

Keywords: *The History of Nanming Dynasty; Kings' Biographies / Tables*; Correction; Hereditary List

【责任编辑:王兴全】